

憶先岳父李熙謀博士

(本文插圖刊第122頁)

江祿煜

我的岳父李熙謀(振吾)博士，離開人間已過十個年頭了。他於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去世的噩耗，抵達住在美國東岸的我們時，我剛才接受美國陸軍部一份工作，正在辦理報到手續，一時無法回臺奔喪，而我內人正患染流行性感官，這一突然而來的驚人消息，使她的感冒立刻加重，那時她的妹妹即將從香港飛赴臺北，在越洋電話裏，勸她不宜遠行。在這漫長的十多年歲月裏，我們一面耿耿於懷，悵惘莫名；一面等待一日，親去靈前行禮。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底我退休後，即與內人飛往臺北，要向在陽明山上先岳父的墓地致敬，瞻仰交通大學為紀念他創辦電子研究所功績而建的「振吾亭」，並拜訪他生前的親友，感謝他們幫忙辦理喪事。我們的兒子康城，一九八五年秋去臺北做事，他恰好也可參加這些活動。對於這次旅行，我與內人已計劃甚久，一旦即將實現，心中有許多感想和期待。

西子湖畔初次見面

一個初冬的早上，當載運我們的西北民航機，正向太平洋彼岸——臺北——飛去，我隔着窗外的白雲，腦海中頓然浮起了在同樣一個天氣晴和的日子，我第一次遇見後來成爲我岳父的一幅圖畫；那是五十多年前的杭州青年會的西餐廳。這裏，先談李熙謀先生跟我家鄉與家庭的關係。

他跟我家是世交，與先父且有金蘭之譜。李先生又是我們嘉善縣西塘鎮的「神童」，第一名考取浙江官費留美，第一個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回國後，在一九二〇後期和一九三〇初期，他在杭州擔任浙江大學工學院長和浙江省電話局長。我們小鎮上的人，無論爲自己求職或子女上學，都要找他們認爲在省城裏最有辦法的同鄉幫助。我父親每年春季總帶着母親、二哥與我，到杭州去「燒香」，其實是「借佛游春」。有一年，在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先生及民政廳長朱家驊先生主持下，中國第一次規模偉大、內容精彩的西湖博覽會在省城揭幕，李先生被請爲工業館長。我們也去趁熱鬧，到了杭州。雖然並不是要找事，亦不是想進浙大工學院，但我們還是去拜訪我們鎮上在杭州最傑出的同鄉李熙謀先生。而李先生則請我們在青年會吃西菜。

當天他一個人來，我依稀地記得他穿了筆挺的西裝，我們當然是穿中裝。他很嫻熟地使用刀叉，吃的什麼菜，現在已記不得了。不過，他跟我父親談到同鄉人來杭謀事及投考的幾句話，我却記得。他說：「不論用人或錄取，我是採用人主義，但如要爲桑梓效勞的話，在能力範圍內，我極願意幫忙。」那時，我是十多歲的中學生，他問我在何處上學，喜歡什麼學科。我對他第一面的印象，是一個神采奕奕、風度翩翩的現代教育家，跟在鄉下有些仍是多烘頭腦的老師，

不能同日而語。

自從這次會面後，一直沒有再見過他，直到抗戰勝利，他從後方回到上海，負責教育局的職務。那時，我已跟他長女碧英(令儀)小姐結婚，且生有一男孩。不過，在抗戰初期，我曾將我在「東方雜誌」發表一篇關於中國行政問題一文的副本，寄到他上海的寓所。後來，我聽內人說，她看見這篇放在她父親寫字枱上的文章，便問：「這是不是我們西塘的江祿煜呢？她父親答：是的，並微笑地對他女兒看着，似乎等待她也許有其他問題，但是她沒有接下去。」

紐約重逢訪友話舊

我跟先岳父接觸最多的時期，不在上海，而是先在紐約，後在臺北。五十年代我在紐約大學研究院讀書時，他曾來美國多次。那時，他剛辭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日代表，回臺後，就聘爲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員兼執行秘書、教育部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他第一次來紐約時，我似乎記得他是政府派來考察美國原子能和平用途的代表團成員之一，其他代表亦都是科學家。有一位是物理學家，即後來主持臺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的戴運軌教授。因爲這是自從跟岳父在上海分別後第一次的聚首，我特地僱了計程車從紐約市中心到郊外的甘迺迪國際機場的終站去接他。這代表團不久即去華府接洽公務，拜訪當時駐美大使

——各方景仰的元老外交家顧維鈞博士。

岳父另一次訪美，是一個人來的，他住在孟哈頓東區的公寓裏，我們有較多的時間談話。他講到臺灣各方面的進步，政府的勵精圖治，青年的力爭上游。他特別提到當時教育部長張其鈞先生的任勞任怨和埋頭苦幹。他又告訴我，在許多國際組織，像教科文組織，上層的主管人士往往忙得席不暇暖，而下層工作人員，亦勤奮不怠，唯有一部份中級職員，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這是他的經驗之談，對於當時正在研究國際組織的我，實是寶貴的啓示。

在他旅紐時期，我們不時出去訪友。有一次，到東區八十一街胡適之先生寓所，去拜訪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他一聽我的聲音，就說：「您一定是上海附近的鄉下人。」我說：「我家原籍是安徽徽州，可能是跟胡太太（姓江）五百年前共一家。」那次由岳父介紹而認識我一向敬仰的胡適之博士，非常高興。後來在我朋友經營的中茶館內，好幾次碰見胡博士，總是招呼稱談片刻。岳父與我，又去參加紐約華美協進社主辦的每月聚餐會。在那裏，他碰見不少舊同事和老朋友，像程其保先生（他們兩人及另外三位教育家，一九三〇年初期，奉命考察歐洲各國教育，岳父負責職業教育）、潘公展先生（勝利後，選爲上海市議會議長，岳父其時任上海教育局長）及趙曾珪先生（上海市公用局長，爲岳父同僚）。當時，岳父恐怕已有交大復校的意思，所以想跟交大校友，像曾珪先生，交換意見。爲吸收科技方面的最新知識，他老人家託我向學校圖書

館借出有關核子科學的書籍。他的好學不倦精神，我無任欽佩。

我們翁婿間的談話，當然不限於「讀書」、「辦學」及「研究」等大道理，亦有輕鬆的一面。有一天，我請他到外面吃飯，並到「無線電城」看電影和雜耍。他在美念書的時候，這座娛樂場所尚未存在。那天的電影好像是「羅伯斯先生」(Mittor Roberts)，由亨利方達和最近去世的傑美凱格內主演。故事是描述太平洋戰事末期，一艘美國供應艦在離沖繩島不遠的海面上從事補給任務的情形。想不到幾年後，我們前往沖繩島一住十多年，而岳父亦來該處看望我們（後面再提）。在我們回公寓途中，在一家歐洲人開的麵包店，買了一個蘋果蛋糕 (Apple cake)，他說這比平常吃的蘋果餅 (Apple Pie)，滋味更好。一試之下，果然如此。這些日子，我跟他朝夕相處，覺得他的舉止瀟灑，跟我在杭州第一次遇見他時，並無改變。而他的實事求是、雍容大度以及愛國熱誠，給我留下極深刻印象。至於他的閒話家常，使我們尊卑關係，更富有人情味。

發展科技爲國儲才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四年，我跟內人同在沖繩工作，因此我們和小孩康城，常去臺北看他老人家。那時，他擔任的職務較前更多，除原子能委員會委員與執行秘書外，又兼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同時，並積極地籌劃交通大學的復校，受聘爲電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作爲復校的先聲。

他對於這方面的貢獻，他的同事、友人和政府主管人員，知道的一定比我多。在「李熙謀先生哀思錄」中，孫亞夫先生、盛慶琮院長等的悼文，已有很詳盡的報導。我這裏所要略爲提起的，是我們親自體驗的事情。有一時期，他每週至少二次奔波於臺北與新竹二地，風雨無阻。新竹是交大電子研究所的所在，亦是復校後交大的校址。我們在臺北時，總是在黃昏時，到臺北車站等他回來。在七十年代初期，他轉任東吳大學理學院長，差不多每天往來於臺北市與外雙溪之間。以七、八十歲的高齡，經常這樣的僕僕風塵，比他年紀輕好幾歲的學生和同事常說：他們是吃不消的。雖然由於保養有道，岳父體質素健，但是，我想，他幫助政府發展科技的決心，爲國家造就人才的志願，亦是使他鍥而不捨、貫徹始終的一重要因素。

奧京開會沖繩小憩

岳父不但時常奔走臺北與新竹、臺北與外雙溪之間，從一九五九年起，他差不多每年到奧京維也納出席聯合國原子總署大會。除第七、九、十、十二屆爲副代表外，從第三屆起到十三屆（一九六九年），他都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主要任務是維護中華民國的席次，同時並爭取總署繼續對臺灣原子能和平用途的支助，在這兩方面，他的努力確是成功。有時，他亦出席其他國際組織的會議，如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一九六五年十月，岳父與當時教育部部長黃季陸先生從海外開會回來，路經東京，我們事前邀

請他們兩位老人家到我們沖繩家裏，盤桓數天，他們欣然同意。這恐怕是第一次部長階級的國府要員蒞臨沖繩島。為歡迎他們，我們在美軍的港灣文人俱樂部舉行一午餐會，作陪的，我們請了橋團領袖、幾位在琉球大學授課的美國教授，以及我們辦公處的長官和同事。因為這次是非官式的訪問，所以美軍方當局和琉球民政府官員，都沒有邀請在內。午餐會結束後，我們陪同黃部長和岳父「走馬看花」地遊覽沖繩島上的名勝，像當初一九四五年沖繩戰役末期日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長剖腹自殺的山崖，代表琉球傳統的「守禮之門」，新年期間本地人必去謝神祈福的「波之上」寺，以及美軍各項設備。

那天早上，我們大家都坐在我們寓所前的陽臺上，遙望下面公路後的風平浪靜的東海，主客的心情都輕鬆得很。岳父說，這幾天來開會、講話，忙得真是廢寢忘餐，回到臺北後，又要撰寫報告書及拜訪各當局，亦必非常忙碌，在這中間，能有一、二天的休息，對身心有極大裨益，黃部長亦表同意。並講了幾個笑話。我們能有這機會，略盡地主之誼和小輩的責任，亦覺得非常安慰。

重回臺北難拾舊歡

當內人與我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辦好入境手續後，看見我們兒子康城在等待着。我頓然想起以前我們來臺北時，岳父總是在機場接我們。所以，這天我們一面看見兒子，十分高興，一面懷念我岳父，無任

悵惘。從桃園機場到臺北市中心，計程車要走一小時左右。那時，夜幕已降下，窗外沒有什麼好看，我又回想到過去多次探訪他老人家時，他生活方式上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幾方面。

岳父自奉甚儉，但寬厚待人。我們每次從海外回來，總帶點洋酒、香煙、巧克力糖以及其他舶來品。這些東西，他大部份都轉送給他的朋友們。他對我們小輩的來臺，表示歡迎，常請他的老朋友一起到家裏吃飯，這流露了他愛護子女和慷慨好客的天性。我們第一次來臺時，他老人在百忙中，陪我們遊覽故宮博物院與陽明山公園。有一個週末，我們一起先到臺中訪問東海大學（也可說是我的母校），然後去日月潭住一夜。多年來，岳父常是單身在外，在這短短的一天、一晚，有女兒、女婿和外孫陪着，遠離市塵，徜徉於山水之間，尤其是置身於「桃花源」似的日月潭，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感到非常愉快。此情此景，我永不會忘記。

岳父一位好朋友曾經說過：「平日振吾先生除工作外，就是運動和讀書，別無其他嗜好。」對於運動，我是門外漢，只記得每星期二、三次，他一清早起身，與端木愷校長到郊外去打高爾夫球。至於「讀書」，我想這應當包括「寫」書、「編」書和「譯」書。除了三十年代他在歐洲考察教育回來後，所撰寫關於該處各國技術教育外，我所親自看到而外界不提及的，約有下列數項：岳父與交大電子研究所六位教授合作撰寫「電子科學之發展趨勢」，對微波工程、自動控制、電漿、雷射、半導體電子學和電子計算機等

，有深入淺出的說明。

另外，他告訴我，有兩個翻譯計劃正在進行中。一是中翻英，是將三卷的「天工開物」翻成英文。該書係明朝宋應星撰，歷舉中國歷代天產、人工的物品，像五金、丹青、舟車、珠玉等，注重其製造方法。他說，書中所舉出的許多工具，沒有適當英文名詞，這是一個困難問題。第二個英翻中的計劃，亦有類似的困難。這計劃是把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博士（Joseph Needham）的七卷「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翻成中文。據我岳父說，這一計劃的主要困難在於「還原」，就是怎樣找到本書中所引用字句的原文。李氏在撰述這書時，參考了很多的中國古書，有些是晦澀而名不見經傳的冷書，在臺灣實在不易找到。在岳父去世時，這兩個翻譯計劃，似乎尚未完竣。目前情形如何，不得而知。

振吾亭中沉思往事

我們到了臺北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拜訪先岳父的朋友，接洽前往新竹參觀交大「振吾亭」和上陽明山掃墓的事宜。許多朋友都極願幫忙，特別是陳亞芳女士（曾任臺灣電信局長金耀輝的太太）。訪問交大和探望「振吾亭」，很順利的做到，這要歸功於陳女士的熱心和交大郭南宏校長的支持。在陽明山上找尋先岳父的墓地，想不到遭遇相當困難，最後，要感謝他老人家「在天之靈」的「啓示」，我們終於達成心願。

到新竹去是搭交大郭校長派來的中型巴士，

一小時左右就到達了交大校園。在校長室，這位年輕的大學首長就接見我們，約略地介紹交大的現況，特別提到今年（一九八六）是交大九十週年校慶。我想，如果先岳父仍健在，他老人家一定會活躍地參加校慶的各項活動。郭校長並送給我們關於交大的紀念品，然後陪我們參觀校園內各座建築物，像中正堂、圖書館、資訊館、體育館、科學館等。在圖書館裏，我們看見有一室，專門陳列前交大校長凌鴻勳先生所贈送及著述的書籍，以及有關凌校長的文件。我不禁想到，先岳父一生遺下來的信件、文稿等紀念品，不知在那裏。後來，在校園中，又看到凌校長題的「飲水思源」石碑。這四字形容先岳父對交大復校的貢獻，非常恰當。郭校長說，為紀念第一任所長李博士的功績，他們電子研究所的第一期（郭校長亦其中之一）和第二期的畢業生，發起並聯絡各界集資建造「振吾亭」，請前教育部長亦是先岳父的好友——黃季陸先生——題字。我們與郭校長緩步走到該處，這亭是造在湖畔，傍花隨柳，一葉扁舟，風景優美。校長說，天氣好的時候，學生常到這裏念書或散步，「水木明瑟」，確是一個「流連忘返」的所在。最後，另由一位教授陪我們去參觀跟先岳父最有關係的電子研究所，它是在校園的另一部，是最早蓋起的一批建築物。我們走進電子研究所前，因為這裏陳列有許多精密的電腦機器，為避免把灰塵帶入，每人都穿著黃色的塑膠罩袍、穿著塑膠拖鞋和戴上塑膠帽子。我對於電腦，一無所知，只想到先岳父，根據一般人說，是他首先引進臺灣第一部電子計

算機，而現在臺灣各商店、各機關、各工廠，更不必說各大學的研究所，都有各式各樣的電子計算機。他「筆路藍縷」的精神，「慘淡經營」的決心，有此成就，在天之靈，亦必含笑而無憾了。上陽明山，先後共有三次。第一次，搭一位曾在財政部任事的錢先生的車，他是去瞻仰他父親的墓。同行的陳女士，她從前去過先岳父的墓；這一次，目的是先去找到所在，然後再選一吉日，準備食物、鮮花等，全家（包括小兒康城）登上墳。可是，找來找去都尋不到。我們便輕聲地向他老人家懇求：這次雖然不是專誠來禮拜您的墓地，但是企望您給我們一個啓示，以便下次全家再來。果然，當我們車子開下去時，看見一個看墳的老人，立刻請他找尋國大代表李照謀先生的墓地，然後以電話通知。隔了幾天，陳女士的電話來了，那看墳的老人已找到先岳父的墓。於是，我們三人（包括康城）搭陳女士的車，又向陽明山進發。原來岳父的墓，因為好幾年沒有修掃，通往墓地的小徑，都已被野草遮滿，從外面看過去，簡直不會知道有墓地隱藏在一團叢林之外。幸而有兩位年輕人在前，推開兩旁的樹枝，踢開地上的野草，打出一條路來。走近墓地，首先看見的是先總統蔣公的題字：「振吾同志千古，志績長昭，蔣中正」。我們獻上糕餅、水菓和鮮花，並鞠躬致敬。我內人給錢於看墳的人，酬謝他領路之功，並開照他以後不時來清掃墓地，同時剪除附近的野草，並對他說，以後時常要來。我們不能長住臺北，所以這次找到了一個人，可以長期照顧墓地，我們做小輩的人，亦了結

一件心事，因此感到相當輕鬆。

清明時節左右，我們又去掃墓一次。當我將要離開墓地，走下小徑之時，忽然想起因為我預定三月末回美，不知那一天再來臺北，上陽明山瞻仰他遺像，心中沉重得很。一九七三年秋他在松山機場送我回沖繩，那是見他最後的一面。其後，他時常有信來，翌年我們回美後，他每次寫信給我們，對找事一方面，有極誠摯的教誨：「你們在美找尋工作，一時得不到適宜處所，實不必着急。Daniel（指康城）寫論文時，須到臺灣來找資料，可住在我處，頗為方便。」後來，又有一信：「謀事千萬不要太急。在 Daniel 處，你更不可顯出焦急表情，使他讀書心情不安。」推愛之切，期許之深，我們無限感動。一九七五年春，我得到美國陸軍部一份很好的工作，因為要急於辦理各種手續，因而直到二月中才寫信告訴先岳父，但信到達臺北的一天，他已歸真。「一着之誤」，終身遺憾。

想到這裏，下意識地回頭再向墓地一望，只見先總統蔣公的四個大字「志績長昭」。岳父一生為國家、教育、科技和青年的貢獻，這四個字表達得恰當極了。他的壯「志」業已圓滿完成，他的功「績」則永在史冊之上。我尚有何憾？！一九八六年五月美國。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五三六四二〇六·五三六五三一